

弁言

周家修

悲莊的，殘酷的，革命的，驚心動魄的五月各個紀念日，又將一一來臨了！深印於腦海而永不能忘去帝國主義，痛惡蠻橫的面孔，和無理的壓迫，又明顯地一幕一幕，好像電影那般的在中華民國，各個的頭腦中開演！我們更忘不了北京政府，軍閥，政客，和一切反動份子種種賣國禍民的事實！

但是十餘年來，自五月各紀念日發生以後，確然驚醒了大多數醉生夢死，一盤散沙似的中華民國。北伐的告成，未始不是五月各紀念所造成的好果！

今年更較有意義的，就是定為解決一切國是，奠定黨國基礎的國民會議，也訂在五月五日舉行了！我們要加以正確的分析 and 認識，我們決不應該這樣默默無所關似的，因此，就感着要發行這本小冊子的必要！

不過，這只不過是少數人的努力，難免沒有不妥的地方，還希望諸讀者，給我們一個指示。

二十，五，一。

本屆執行委員

候	候	宣	組	常
補	補	傳	織兼訓練	務

陳	吳	周	程	劉
嘉		家	蔚	瑜
勛	傑	修	南	貽

目錄

井 言.....	周家修
國民會議與國民黨.....	邵力子述
怎樣才可稱之謂革命文藝？.....	張烈記
出席國民會議以前.....	潘公展
五月之歌.....	吳開先
一般人對於國民會議應有的認識.....	蘇鳳
慶祝國民會議與今後的努力.....	潘公展
國民對於國民會議代表應有認識.....	(政)
何謂國民會議.....	茅賓初
誰創造「大同世界？」.....	楊城
五月國恥與帝國主義.....	星光
日帝國主義者和五月幾個紀念.....	王普琦
	橫波

目 錄

二

五月紀念的使命·····	大可
五月革命和民族自覺·····	偉民
外備與革命運動·····	殘兵
怎樣與帝國主義總算賬·····	史一之
在「五一」節工人應有的覺悟·····	光
五三的痛史和今後對日人應有之態度·····	桂季荃
五四運動紀念之意義和今後的努力·····	周家修
移民養路政策施之準備·····	徐明翼

國民會議與國民黨

邵力子述
張烈記

國民會議與國民黨的關係，在總理北上宣言裏本已言之甚詳，現復分作三段來講，使更明瞭：一、中國國民黨的性質比歐美各國政黨與一百多年前法國提倡之天賦人權有不同，天賦人權，至今本已成爲疑問，人類在社會應享如何權利，則應盡如何義務。我們是革命之政黨，凡革命之人始與以國民之權能，至少也須不反對我們的革命。總理在三民主義上說，民族民權民生是國民黨用以謀全國之福利的。在五權未成熟，人民尙未至自治領域之時，國民黨宜毫無客氣去握政治權能。且看世界上最強之國家，失業的恐慌，分配的不均，盜案掠奪的時間，他們的自由是真抑假？又如日本欲當選一議員非有二十萬日金絕對不辦。試問這二十萬日金是那處來？優秀份子有才能而無錢的能辦到嗎？非是少數富豪閥老與團體供給而是誰？既是如此，則他們將來究屬替誰說話？當不難明瞭。可是爲何歐美除了俄羅斯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是一黨握政外各國都有幾個政黨而中國也祇需一政黨呢？這是很明顯的，他們是德謨克拉西政治的方式，可是 Democracy 現在已至日暮途窮的時

期了。日本雖亦如此，因為他們得的機會較我們早，當時已有實業之基礎；而德謨克拉西是完全化錢的東西，所謂“Democracy Costs money”現在我們之商業尚無基礎的時期，而運用他們的方式，是很危險。外國的政黨，各有特殊階級的根據，而中國並無階級之存在不過土豪劣紳軍閥霸占着局面，所以要救國建國，國民黨是毫不客氣來握政。我們並非永遠如此，不過把黨做個先鋒隊，並非先鋒隊到的時候，自己去吃去玩，惟想盡方法求大眾都去吃去玩，而實現這種要求最有效的方法，乃是開國民會議，使國民黨的政綱轉變為全體國民的政綱。本來，總理遺囑上說，最短期間要開國民會議，現在實嫌遲了，在國民黨第四次全體會議本已有這提案，想在編遣過後舉行，不意後來發生變端，軍事絡繹未定而拖延至今，這也不得已的事，國民會議的目的，是使中國永遠無內戰，軍閥無藉口，全國國民依照政綱負起救國建國來謀統一與建設的任務。二、國民會議用何法召集，因中國土地之大，社會問題之複雜，自去年十一月至今不滿八月的短期內要辦理這事，自非容易，後決定以全國人數作標準，約一百萬人出一代表；同時亦用職業為指標，分農，工，商，教育自由職業等五團體。所以總理北上宣言裏有「各政黨」的話，而現民會選舉

祇國民黨一黨呢？緣故是這樣的，因當時國民黨尙未統一國家，取得權能與相當之基礎，總理是特別寬大的，而現在情形不同，所謂「聯省自治」辦法，是不能達到救國目的，所謂共產黨是專務殺人放火，絕非歐美的可比，所謂國家主義派，僅是擁護五色國旗與軍閥，是否他們的理論主張是國民黨所無，而非他們來做不可的？即使他們的政策能夠成功而打倒了帝國主義，亦不過造成新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的不安，我們知道帝國主義不過表面富強而實際潛伏着很大的危機，而中國國民黨是要聯絡弱小民族去踏進世界大同的樂土而永無上述的弊端，他們都不能認為公開的政黨而我們也不須有別的政黨再來活動的必要，因為中國工商業沒有大的基礎。這並非是本黨專政我們自己所允許的期間很短，我們要把政綱和頒布憲政日期提到國民會議來解決。並且制定約法，這約法與別國有異，是要達到全國訓政自治的約法，在試行約法期間，使全國國民瞭解本黨，亦使全國國民拿國民資格起來質問國民黨關於違反約法的舉動，目下的情形外患未定，人民痛苦未除，工作正殷，不但國民黨不得卸責，即國民亦宜共同負救國建國重任相互督促，這是國民黨與國民會議主要的關係。我們要全體國民來接受三民主義；我們更相信在建國大綱裏，總理特意

提出「建設的首要在民生」一句，這是我們現在工作所根據的原則，所以我們也要國民會議來接受建國大綱；最後更緊要的，即廢除不平等條約，要更堅強確切的表示，國民黨既握了權能，國民是應該向她責成的，我們不要以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是談何容易，祇要覺得這件事是非做不可的，那麼這一定可以成功它。總理在北上宣言也說用國民會議來廢除不平等條約，總理固然用黨來作實行革命的手段，實在還是要人民的革命力量，他是最尊重人民革命力量的人，這是在國民會議中最當努力的事。凡規定的政綱，約法的草案，總理的遺教，都要變成人民所有，使國民黨不放棄責任而給人民督促與共同担负這使命。三、在國民會議開了以後，全國人民對於中國國民黨當更能密切認識與了解，以後國民能得起來說話。但是須明瞭國民會議是訓政時期的機關與國民大會不同，並非憲政開始的階梯，人民對於黨有發言權，而在訓政時期內黨的責任是並不減少，大家在這完成訓政的目標下，要同去努力。或許有人疑問，現在權能既握在國民黨手中，你儘可說東有土匪，西有亂變，把訓政時期任意延長。可是這很清楚的，祇要戶口調查竣事，地方自治有了模型，便應踏入憲政。如有違反公衆的地方中國國民黨的責任是放不掉。又須知道國民黨並

非包辦，包辦什麼意思，是爲自己謀利益，而中國國民黨並非爲自己謀利益，我們要負了這責任來喚起民衆的覺醒，我們也並不反對任何人民都可來參加革命。

因時間匆促，未繳邵先生校正。

記者附註

怎樣才可稱之謂革命文藝？

潘公展

民國五六年的時候，胡適之氏等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發表他們的文學改良的八不主義，轟動社會，其結果乃祇落得一個文腔革命的勉強完成。文言的詩文的勢力，固然被白話的詩文所搖撼，取而代之，打好新文化運動的原始基礎，可是白話詩文的內容依然是沒有充實，不，簡直是沒有確切妥當而又一貫的主義，可以視為新文學所寄託的生命。到了民國十五六年，相隔十載，「文學革命」的口號忽地一變而為郭沫若氏等「革命文學」的口號。這，毫無隱諱地說，比較那空洞而無主義只圖文腔改革就認為滿足的文學革命，固然進了一步，可是其所謂「革命文學」的內容究竟如何，主義究竟如何，是否牠的產生適合於中國目前環境的需要，以及如何使牠真可成為有助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文學，實在值得我們稍加檢討和考慮。

兩三年以來，尤其是今年，好似雨後春筍的所謂「革命文學」也者，老實說，就是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學，也祇就是好像時髦的所謂「普羅」文學。一班自命為革命文學家的人，自己不問一問是否真的屬於普羅列塔利亞，是否真的曾經體驗

過普羅列塔利亞的生活，祇知道一切文藝都是「宣傳品」，都是可以利用作階級鬭爭的「武器」。就聲嘶力竭地或輕描淡寫地寫幾句口號或標語，夾在詩和散文裏，就算牠是「普羅」文學。文學是不是有階級性，固然是值得駁難的一問題，而這種蘇聯留聲機式的普羅文學，在中國目前來鼓吹階級鬭爭，實在不是中國所需要的革命文學。

文學是如此，藝術也大抵如此。中國現在是國民革命時期，在革命過程中間，文藝既然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當然是需要一種富於革命情緒的文藝，以與國民革命的進展相適應。單是空洞無物的白話詩文，固然決不能負起這個使命，那虛偽投機欺世盜名的普羅文學和普羅藝術，滿染着階級鬭爭的色彩的；也適足以分散國民革命的陣線，阻礙國民革命的進展。不但此也，中國國民革命的主要目的，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牠的入手方法，首在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以恢復中國民族的地位，故在目前要使國民革命加速度地完成，非有一種從民族主義出發而以喚起中國民族的自覺爲目的的新文藝，在全民族的生活裏灌注着民族的新血液不可。如果一任這些普羅文學普羅藝術逐漸地猖狂，把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消沈下去，到末了竟可以

怎樣才可稱之謂革命文藝

祇認得蘇聯是他們的祖國，而整個的中國將爲蘇聯而犧牲。可見他們所謂「革命文學」也者，在先前，或許不過一二無聊文人賣身投靠，憑着金盧布的壓力榨出來幾聲吶喊，而充其極可以亡國，可以滅族。一直到最近，我們才見有新興的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在中國萌芽起來。這固然是由於一部分人的努力，然而大概也許是時代成熟了的產兒。祇有民族主義的文藝，真可以認爲中國所需要的革命文藝。也祇有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可以希望爲中國民族始終培養革命的根苗，開拓革命的生路。

或者有人要問：「中國國民革命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在中國提倡革命文藝，自然應該提倡三民主義的文藝，爲什麼默認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可以負起推進國民革命的責任呢？」我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當然也應該有這種疑問。可是我又仔細地從三民主義的立場觀察他們所努力的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仍覺不勝其同情，以爲中國的革命文藝將一定要從民族主義的懷裏誕生出來。可是有一點，我要鄭重爲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者告的，就是新文藝運動所從而出發的民族主義必須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而非先前大斯拉夫主義大日耳曼主義……

……等等的民族主義，然後那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才可以救中國而不致使中國重陷於錯誤，蹈人家已往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覆轍。

我們先從文藝的性質和要素來看，覺得文藝原來是民族的，故祇有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才是順理成章，事半功倍。所謂文藝的性質，原是人生的表現，批評和創造，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文藝是離不了人生的，尤其是離不了作家的個性。換句話講，文藝乃是作家將秉他的一個性所體驗出來的人生表現出來而再加以批評或創造的一種作品。再進一步講，一個作家固然有他的個性，而同時他所體驗的人生，却是某民族某時代某環境的人生，故他的文藝作品，無論如何，除包含個性外，不能不以某民族某時代某環境為牠的背景。法國的批評家戴納氏(Taine)用他著名的種族，環境，和時代的公式去解釋文學，的確有獨到的見地，所謂種族，即指那一個民族的遺傳氣質和性習；所謂環境，即指那一個民族的氣候，地理，政治，和社會情況等等；所謂時代，當然指那一個民族發展史上的某一階級的時代精神。所以，一個文藝作家，儘管是天才，有他獨異的風格，但他的作品總顯然地充滿着民族精神，惟其如此，我們才有所謂希伯來精神或希臘精神等等，也惟其如此，才有所謂

希伯來文學或希臘文學等等。我們知道，歷史乃是僅僅探究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外部，如果要真的了解某民族精神的特點。非從事于探討研究某民族的文學不可。文藝的富於民族性既如此，那末，我們要把某一個民族復興起來，要把某一個民族的文化復興起來，例如中國目前的情形，怎麼可以不把民族主義作為文藝運動的中心思想呢？怎麼可以不把文藝運動作為恢復民族地位的自然的基本工作呢？

我們再從歷史上看，堅強的民族意識往往為文藝所喚起，其例不勝枚舉。因為民族構成的要素：第一是血統，第二是生活，第三是語言文字，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風俗習慣。如果是血統相同，而生活，語文，宗教以及風俗習慣並不大相懸殊的一羣人的集團，那便是民族。惟有文藝，可以用某民族自己的語文，把自己的生活，宗教，風俗，習慣為背景，描寫着這一個血統之下的一羣人的狀況，因而喚起那一羣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裏所引證的希臘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日耳曼的尼貝龍根，英吉利的皮華而夫，法蘭西的羅蘭歌，以及我國的詩經國風之流，的確是能夠喚起民族意識文學；還有馬丁(Henry martins)的法蘭西史，婆他(Batta)的意大利史，巴來革(Franz palacky)的希卜米亞史，善卜

爾(Alexander Kempal)的羅馬尼亞史等等，無一不是喚起民族意識的作品。從此可知在一個民族的民族意識消沈的時期，要重復喚醒過來，固然或許有他種方法，而最能深入全民族的心坎的莫過於文藝。尤其要知道，民族性的感覺，像其他心理的特性一樣，愈當被打擊的時候是愈強烈。拿破崙的野心造成了德意和西班牙的很有力的民族運動；蘇聯革命初期列強對於蘇聯的干涉和武力壓迫，適足以促成蘇聯人民內部的團結和共產政府的維持，在中國目前那樣情形之下，民族的受壓迫，已經到忍無可忍的地步，在理，民族性的感覺，應該愈趨強烈，然而還有拋開了整個民族的利益來爭個人利益的軍閥，政客，土匪，流寇，和爭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徒，繼續不斷的蠢動，這是因為沒有民族主義文藝去適應那已被激發着的民族意識的要求，從而把握住那個民族意識，使他發揚光大起來的緣故。所以，目前推進國民革命的責任，應該由文藝作家擔任起來，努力地創作那以喚起民族意識為中心思想的文藝。俾斯麥說過，新德意志的創造，除了靠普魯士軍隊以外，德國的歷史的教授實在第二重要的，我們也可以仿他說一句話：新中國的創造，除了靠那真有三民主義的訓練的國民革命軍以外，中國的文藝作家實在是第二重要的。

最後，我們從整個的三民主義立場看來，也覺得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實在是推進國民革命的一種重要而又切實的基本工作，何以故？第一，我們確實地承認三民主義是一貫的，是連環性的，換言之，是整個的，可是從三民主義發生的程序來看，在事實上，在理論上，却均有先個先後。中山先生曾說過：「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主義，再由民族主義進到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發生的程序，就不能外乎此例。中山先生在決心革命的初期，首先使他受着刺激，當然是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民族受了滿洲人和帝國主義者兩重外族勢力的壓迫的事實。中法戰後，一八八五年北京條約締定的一年，就是中山先生決心革命的一年，而日本維新以後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的結果更使他感覺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必要，對於革命抱着無窮的希望。所以就整個的世界說，民族，民權，和民生三個問題在現代正是需要同時解決，而就二三百年以來，尤其是最近八十多年以來，中國所最需解決的問題而論，還是一個民族問題，中山先生最初革命的動機是在求中國民族的獨立，就是他的遺囑上面還是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故三民主義儘管是一貫的。儘管是連環的，但這個一貫的連環却總有一個

起點：那便是民族主義。如果沒有辛亥革命的脫離滿清一族宰制，決沒有共和政府的建立；如果不努力於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和一切外國特權的取消，決不能見本國實業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充裕；這是顯而易見的實事。由此可知三民主義的革命，在一方面，固然待最後的民生主義的實現，而後可認為完全成功，在另一方面，却必先從最初的民族主義入手，而後才是切於實際。故要求政治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必先求整個民族在國際地位上的平等：換言之，我們固然要用政治運動去促成民權主義的實現，可以用社會運動去促成民生主義的實現。三民主義誠然是整個的，可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工作在事實上不能不分工合作，以收殊途同歸的效驗。所謂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實在就是民族主義各種方法中間一種必要而且根本的工作吧了。所以從三民主義發生的程序上面看，三民主義既然植其基礎於民族主義之上，而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就不啻時刻刻地以新鮮的血液灌溉着民族主義的根苗，其有助於國民革命的推進，毋待煩言。故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在中國的確可以喚醒民族意識，而為逐步完成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打下很深固的基礎。

第二，我們從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演進來着，才知道惟有把三民主義中的民